



# 刘邦称帝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孟宪实

**摘要:**对于先秦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界有诸多讨论,就制度而言也是言人人殊。夏商周是中国的贵族时代,政治则为贵族政治。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剧变,正是贵族政治瓦解、士大夫政治发生发展的过程。秦朝统一中国,秦国制度推行全国,中国的贵族政治告别历史。但是,在最高领导人出身问题上,还保留了贵族政治的最后一点残余。秦末农民战争中,平民出身的刘邦脱颖而出。刘邦称帝成功,宣告中国历史告别了贵族时代。新的历史如何概括,史家多有讨论。赵翼曾经用“布衣将相”概括西汉初期的政治局面,基于历史实际与理论思考,本文认同并使用“士大夫政治”这个概念。

**关键词:**先秦;贵族政治;刘邦称帝;秦汉;士大夫政治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6-0044-08

刘邦是平民出身,这是他与此前君主的最大不同。班固《汉书·诸侯年表》序:“亡亡尺土之阶,繇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何则?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铸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sup>[1]364</sup>刘邦出身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贵族背景,通常的说法是起于“微细”,而这里班固强调的是“亡尺土之阶”,即非贵族出身。刘邦仅凭三尺剑而成就帝业,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这一情形只有在贵族政治终结的条件下才能出现,也只有放在贵族政治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其中的历史意义。

## 一、中国的贵族时代

班固所说的“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烈”,是刘邦称帝之前的中国状况。先秦时代的中国,今天的学界认识多有不同,但在班固此说的基础上,或许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从周天子到诸

侯王,都符合“承圣王之烈”这个特点。周朝如此,夏商也大略如此,这就是古史所谓的“家天下”时代的基本特征。“先秦时代”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无关历史特性,如今按照社会形态理论,或称奴隶社会,或称封建社会,资料不足是争议的主要症结。这里,把先秦概括为中国的贵族时代。贵族与阶级是不相等的概念,在生产关系史料缺乏的条件下,由于“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sup>①</sup>,用政治特性定义一个时代未尝不是一个史学方法。政治,大体上以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为核心,控制国家与政府,是权利获得保证的前提,各项法律与制度则是保障权利持久稳定的政治设计。父死子继的家天下特征,强调的是政治等特权的世袭性,但是,这种世袭性特权并非仅仅表现在最高政治人物身上,整个贵族阶层莫不如此。常见的概念如“世族”“世卿世禄”等都在揭示同一个现象。

贵族时代,并非中国独有,考察人类的早期国家,无不具有贵族特性。中国史籍中,把夏朝

收稿日期:2024-09-07

作者简介:孟宪实,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看作“家天下”的开端,但现在看来,夏朝模式已经不是最初的国家形态。侯外庐<sup>②</sup>以及一些日本学者<sup>③</sup>使用“城市国家”概念表达更早期的中国国家形态。日知从世界各地普遍经过城邦国家这个现象出发,认为夏商周都属于城邦和城邦联盟的历史<sup>④</sup>。苏秉琦使用古国、方国(王国)和帝国三阶段说,来描述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历程<sup>⑤</sup>。严文明接受这一观点,并调整为古国、王国和帝国三阶段<sup>⑥</sup>。后来,王震中则给出邦国、王国和帝国三段说<sup>⑦</sup>。几种学术观点,在王国与帝国的划分上是一致的,只有对第一阶段应该怎样定名看法不同。古国具有时间早期的含义,邦国或有城邦之义。其实,考虑到王国是各个国家的联合体,不如把王国之前的国家状态称作“列国”,各国并立,互不统属。如果把夏朝的“家天下”看作王国时代的开始,那么此前就是列国时期。按照与“家天下”相对照的观点看,列国正应该是一个“选贤与能”流行的时代,典型事件就是尧舜禹的“禅让”。王国维也使用禅让概念,但他指出另一个重要现象,即黄帝之后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颛顼,一是帝喾,而“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sup>[2]452</sup>,“世动言尧舜禅让,汤武征诛,若其传天下与受天下有大不同者,然以帝系言之,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者也。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者也”<sup>[2]454</sup>。王国维重视的这个帝系传递,正符合了贵族政治重血统的特征。这说明,夏商周的王国时代,继承了列国时代的贵族性传统。

在学者的研究中,虽然把先秦看作贵族时代没有成为主流认识,但是认同贵族观念或使用贵族概念者大有人在。清代的魏源,批判贵族政治,称其为“世族之弊”：“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sup>[3]</sup>钱穆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另一个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sup>[4]68</sup>。“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sup>[4]71</sup>在先秦时代的历史陈述中,贵族和贵族政治通常不是作为核心概念来使用的,作

为一个时代的政治核心阶层,贵族的历史意义无法突出。雷海宗强调:“春秋时代的列国与其说是由诸侯统治,毋宁说是诸侯与世族合治。列国的诸侯甚至也可说是世族之一,不过是其中地位最高的而已。”<sup>⑧</sup>顾颉刚用“世官制度”描绘贵族制度,并以“春秋的明贤主义”来揭示尚贤思潮<sup>⑨</sup>。使用世族概念也不利于贵族概念的突出。

具体到政治体制,先秦时代的贵族政治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关系问题,分歧较多。日知认为西周到春秋,贵族占统治地位,当时尚不存在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sup>⑩</sup>。徐鸿修认为西周到春秋的中国,是贵族专制的政体<sup>⑪</sup>。张凤喈认为商周两代实行的都是贵族民主制<sup>⑫</sup>。龚杰认为西周各城邦的政体是宗族贵族政体<sup>⑬</sup>。相对而言,强调先秦时代为君主专制的观点依然风头最胜。唐嘉弘认为三代是专制主义国家,并非是贵族共和体制<sup>⑭</sup>。郑敬高认为原始民主因素随着“禅让制”的结束而消失,夏启建立王位世袭制,君主专制开始加强<sup>⑮</sup>。存在君主制是否就等于君主专制呢?有学者研究认为夏商周时期君主专制时代,尚不具备君主专制的条件,不可与皇帝制度时代相提并论<sup>⑯</sup>。

到底怎样看待先秦时代的政治,赵光贤的观点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国先秦时期的政治是什么性质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君主专制政治,有人说是民主政治,我看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假如我们不依照欧洲中心论,而按我国古代实际情况来看问题,我认为应当说我国先秦的政治既不是君主专制政治,更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贵族政治。<sup>[5]</sup>

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贵族共和,作为两种基本的政治体制,整体上都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先秦时代贵族阶层的存在是基本事实,君主属于贵族的成员更毋庸置疑,而贵族与君主,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关系。从人类历史的基本情况看,凡在贵族阶层保有政治权力的体制下,君主的权力多会受到限制。童书业较早使用“贵族政治说”<sup>⑰</sup>,但讨论不多。总之,在先秦时代,在君主制与贵族制无法继续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使用贵族政治来概括这个时代是可行方案。事

实上,用核心阶层概括时代,一直是史学界的常用方法。

考查中国的教材类图书,韦庆远、柏桦是少数直接把西周政治称作“贵族政治”的学者,他们这样描述西周的政治制度:“早期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亲贵合一的基础上,血缘亲族是任官从政的先决条件,世袭罔替,代代相承。在贵族参政、议政、辅政的情况下,官员的权力界限也不分明。……这是贵族政治的必然现象。”<sup>[6]</sup>强调西周至春秋时代贵族特性的著作,还有何怀宏的《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用世袭概括中国贵族时代的特性是准确的,这毕竟是贵族政治的核心特征<sup>®</sup>。其实,贵族政治与贵族社会是紧密相连的,政治与社会无非是观察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夏商周的贵族政治,与分封制、宗法制等紧密联结在一起,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世卿世禄。贵族是以血缘判别亲疏关系的,在中国古代的概念中即“亲亲”原则,所以称贵族为宗法贵族并无不妥。贵族是土地和人民的领主,是政治的当然领袖,如有战争发生,贵族是军事领袖,同时只有贵族有权接受文化教育。世族即贵族,他们世代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或者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政治是贵族阶层的专属,其他阶层不能染指。春秋战国共五百多年,这是公认的历史剧变时期,贵族政治衰落、新政治力量崛起,正是这个历史剧变的本质特征。

在贵族政治下,君主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必须是贵族出身。此外,贵族阶层享受的系统特权,也是贵族政治的基本内容。战国时期,新的政治体制逐渐成熟,贵族阶层的特权不断遭到削弱。秦国的商鞅变法是从制度上取消贵族特权最为彻底的政治改革,而秦国的制度最终因为秦的统一而成为秦汉时代的基本制度。在秦朝的制度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但有一点还保留着贵族制度的尾巴,那就是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贵族出身。

## 二、刘邦称帝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自陈灭六国的原因,概括起来很简单,即各国都有负秦

国,所以遭灭。这种辩白历史上并不鲜见,作为胜利者事后的解释,也不足为怪。但秦始皇的一段谦虚之言,却能表达出秦始皇与汉高祖的不同:“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sup>[7]299</sup>秦始皇不忘强调的是,他的胜利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赖宗庙之灵”。在立郡县还是“立诸子”问题上,朝廷内部有争论,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sup>[7]303</sup>依然有“赖宗庙”这个理由。事实上,强调祖先宗庙,正是贵族性的表现,而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则没有这种资格。

秦汉之际,强调政治人物的贵族出身,依然是一种社会政治传统,所有平民出身的政治领袖,都要面对这一传统。《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陈婴的故事,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文为:

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sup>[7]378-379</sup>

东阳县少年起事反秦,推陈婴为首,陈婴接受,但继续推动陈婴称王,陈婴立刻犹豫起来。最后,是陈母的建议发挥了关键作用,最佳方案是“有所属”,进退有余。为什么陈婴不能称王,因为“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平民出身,称王就是“暴得大名”,所以“不祥”。陈婴应该也有同样的思想,自己的平民出身与称王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于是退却。

陈婴之前,陈胜已经称王:

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sup>[7]2354-2355</sup>

陈胜称王有三老、豪杰推动,可能也有陈胜自身的思想原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历史名句就出自陈胜。陈婴也有少年们的推动,但陈婴却不愿意称王。与陈婴相比,陈胜称王拥有一个更有力的理据,即“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这个巨大的功勋,所以三老、豪杰们的结论是“功宜为王”。功高称王,这是一个新政治理念,前所未有。此前,称王者或是天命所归,或者出身高贵,而两者之间,当然是后者更重要,天命所归通常都是事后缘饰之说。所以,功高称王正是高贵者称王的对立物。

在秦汉之际,坚持高贵者称王的人是广泛存在的,不仅有陈婴和他的母亲,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项羽的亚父范增。

居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sup>[7]381</sup>

范增认为陈胜应该立楚王的后裔为王,但陈胜却自立为王,所以“败固当”,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他建议项梁要接受陈胜的教训,于是项梁找到了楚怀王孙心,并立他为楚王,项梁自己不过“自号武信君”<sup>[1]1799</sup>而已。

范增的观点与陈婴相似,但更强烈。对比范增与项羽的思想冲突,有助于更确切地理解范增的最后结局。项羽在项梁之后,成为军事领袖,尤其是巨鹿之战,树立了强大的威信。秦朝灭亡,项羽火烧咸阳,决定东归,那么政治走向如何?《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很清晰: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sup>⑩</sup>

后文便是包括汉王刘邦在内的封王名单,而项

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根据《资治通鉴》,时间为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sup>⑪</sup>。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为巴、蜀、汉中。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封刘邦为汉王的原因是“巴蜀亦关中地也”<sup>[7]398</sup>,而这个阴谋是项王与范增商量的结果。这证明范增参与了这次封王事件,没有表达反对意见,项羽的策略发挥了效用。所谓策略,即“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先与“诸将相”商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拥护,分封诸王之后才自立为王。封王的先后次序,说明动员了本阵营中最有势力的将军,即使范增有不同意见,也不能不屈服于巨大的压力。

项羽在贯彻自己的策略的时候,也宣布了一种理论,叫作“称王资格”或许是恰当的,那便是功高者为王。项羽把义帝无功与诸将大功进行对比,强调“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项羽的说辞与当初三老、豪杰推动陈胜称王时一致。项羽的称王策略,证明项羽称王存在顾虑,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表达自己的主张,需要通过动员诸将为称王造势。项羽称王的阻力,从现有的资料看,只能是亚父范增。也许是现实压力巨大,范增再没有表达他的出身论,但他与项羽的矛盾并没有消解的迹象。《史记》强调范增最后离开项羽并在返乡途中去世,是因为中了陈平的离间计<sup>[7]409</sup>。其实,项羽与范增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矛盾,就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言,功高者称王还是王者之后称王,是二者重大的政治分歧,矛盾无法调和。范增的观点有巨大的历史背景支持,而项羽的观点则有更强大的现实力量支持。在秦末战争中,六国贵族虽然积极参与,但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来自贩夫走卒的军将才是战争的主角。两大军事集团,不管是刘邦还是项羽,这一特征具有一致性,显现出整体的历史特征。项羽身上多有贵族习惯,但在称王问题上,按照范增的观点,项羽的出身也不具备称王资格。所以,最后项羽走向功高者称王的思想路线,具有必然性。

项羽的分封,并没有带来安宁,最后演变为楚汉战争。战争结束之后,刘邦也面临着政治称号问题。刘邦已经是汉王,这来自义帝的分封,合法性没有问题。问题是,打败项羽之后,汉王的称号已经不合适,刘邦需要高升为皇

帝。刘邦称帝的过程,应该是参考了项羽的剧本。《史记·高祖本纪》如此记载:

(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sup>[7]474</sup>

刘邦称帝之前,韩信、彭越等重要军事领袖都已经封王,当然更多的封侯是在刘邦即帝位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当诸侯将相共推刘邦为皇帝的时候,他们强调的依然是功勋,“诛暴逆,平定四海”。陈胜称王以来,到项羽称王、刘邦称帝,是否贵族出身已经没有意义,最重大的理据是拯救天下,建立功勋。具体而言,三老、豪杰强调陈胜的功勋是“伐无道,诛暴秦”,项羽的说法是“灭秦定天下”,这与刘邦的“诛暴逆,平定四海”之功,理论旨意完全一致,这是新历史条件下的功勋论。

曾经,王是最高的政治地位,秦始皇之后,皇帝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袖,称帝高于称王。不管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国君,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是贵族出身,贵族是政治领导人的必备条件,那是贵族时代的基本政治特征。刘邦称帝,平民皇帝的出现,贵族政治历史画上句号,中国的历史终于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转变。

### 三、士大夫政治

把先秦时代称作中国的贵族时代,政治自然是贵族政治。那么秦汉以后的中国,又当如何概括呢?因为平民出身的刘邦称帝成功,因此就称作平民时代和平民政治吗?本文赞同“士大夫政治”这样的概括。春秋战国的历史剧变,到秦汉基本完成,贵族政治也变成了士大夫政治。贵族政治,是因为贵族占据时代的核心,政治与制度都围绕贵族设置。秦汉时期,士大夫取代贵族的地位,这就是士大夫政治。

大夫与士曾经都是贵族内部的一个等级。到了战国时期,因为士阶层的崛起,士成为文化

与思想的代表,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新的概念“士大夫”因此出现,与此前强调等级的“大夫士”不同,这里的“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sup>[8]</sup>。不仅如此,在贵族社会解体过程中,新的社会职业系统也在形成,这便是士农工商“四民”<sup>②</sup>。关于“四民”,《汉书》这样定义:

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教民,地亡旷土。<sup>[1]1117-1118</sup>

不仅分别介绍了“四民”的特征,还强调了维护“四民”的社会意义。“四民”的划分依据是职业,而四民之首为“士”,没有疑问<sup>②</sup>。贵族时代之后,士具有社会核心阶层的意涵。“学以居位”,也能概括“士大夫”的含义,士的基本特点是“学”,大夫则是有职有位者。士大夫政治的渊源完全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时代“学而优则仕”还仅仅是个别现象,最多是一种理想表达。随着贵族文化下移,士阶层崛起,特别是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在制度上否定贵族政治,从而开始了士大夫政治的新时代。

《周礼》有言:“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sup>[9]</sup>这当然不是标准的士大夫政治说法,但指出士大夫的政治作用已经具有历史意义。根据阎步克的研究,战国以来“士大夫”政治的发展,存在着两条演进线索:一是思想上,儒家“礼治”与法家“法治”思想的不断融合,到白虎观会议,儒法融为一体;二是人群组织上,“学士”与“文吏”关系经过不断演进,终于融合为“士大夫”。汉武帝倡导儒学,但同时存在“霸王道杂之”的政治实践,士大夫政治并非一步到位。直到东汉,“士大夫政治定型”<sup>③</sup>。士大夫与此前的贵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两种政治也能形成有价值的对照<sup>④</sup>。

清代史学家赵翼有西汉开创“布衣将相之局”的看法,向来被认为是历史学家的卓识。赵翼的观点表达在他的名篇《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文中。该文揭示春秋战国以下的历史变迁,言简意深,启示甚多。其言曰:

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

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为相。征战则孙臧、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籍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sup>[10]36</sup>

赵翼的重大结论是“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sup>[10]36</sup>。天地,或可解释为天下,更恰当的解释便是中国。秦汉大变局,仅赵翼文章便涉及历史的多个侧面。

赵翼虽然没有继续讨论秦汉之际大变局的属性,但前后文其实已经涉及,那就是布衣阶层的崛起。如果从西汉一朝而论,因为刘邦自己就“起自布衣”,追随者多亡命之徒,最终成就一个布衣将相之局。布衣将相之说只讨论臣下,如果连布衣出身的刘邦也计算在内,那就超越了布衣将相的范畴,从而应该称作布衣君臣之局。所以,虽然题为布衣将相,但赵翼所论绝不限于将相。赵翼探寻历史的目光没有停留在秦汉之际,而是上溯战国,文臣如范雎、苏秦等,武将如孙臧、白起等,他们都可以看作汉初布衣将相的前身,只不过当时的布衣将相还是个别现象,直到汉初才形成规模,才可以称作“局”。至于布衣君臣之前的中国,赵翼已经给予了归纳,“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用赵翼的词汇概括那就是“世侯世卿之局”,与布衣君相之局相对照,所谓“世侯世卿之局”,君主世袭,大夫世官,正是所谓的“世卿世禄”的贵族时代。

从世侯世卿的贵族时代转变为布衣君相的新时代,其动因赵翼认为是贵族政治导致了严重的问题:“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这种祸乱是贵族体制带来的,既有政治的腐败,也

有制度的败坏。所有的贵族成员都是祸乱的制造者,从君主方面看是“暴君荒主”,从大臣方面看是“篡弑相仍”,结果是人民受虐,肝脑涂地。这种祸乱局面一定要改变,但整体的变迁是很难发生的,于是先从下层开始变化。从下而起,就是逐渐吸纳布衣人士进入政局,于是一批白手起家的文臣武将横空出世,而这在战国时代,早已成为常见现象。所谓从下者起,就是从臣下开始。这个历史进程最终以布衣皇帝登基为完成标志,“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刘邦最终登上皇位,历史意义正在于此。刘邦称帝是世侯世卿转变为布衣君相的最后一步,至此天地一大变局正式完成。

“布衣”这一概念,与“贵族”相对,强调的是平民身份。按照赵翼的分析,从贵族时代到平民时代的发展变化,当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后来,中国史学受到西方的影响,讨论中国历史变迁,学者也没有忘记这个时期,通常会表述为春秋战国以来的巨变,比较集中的其实就是社会形态变迁的讨论,即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问题。比起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影响更大,也有很多学者主张魏晋封建说。五种社会形态的讨论,研究领域集中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以生产关系而言,则集中在阶级关系方面,于是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演变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从贵族时代到平民时代的转变问题,明显不如阶级关系更引人注目。如此,赵翼的重要观点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继承与发扬也无从谈起。

继承赵翼的概念,把春秋以来的历史发展看作从“世侯世卿之局”向“布衣将相之局”的变迁应该是可行的。侯,即诸侯,就是各国的君主。因为赵翼最后讨论了刘邦的称帝,所以把西汉之初的局面概括为“布衣君相”并不违背赵翼的本意。布衣是平民,世侯世卿即贵族,所以把这个时代抽象为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的变迁并无不妥。从国家的统治上层的身份变化,考察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这从来就是历史研究的重大线索,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确实忽略了那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察视角。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忽略呢?可能是“布衣”这个概念的问题。布衣,仅仅强调了是否存在贵族血统问题,但经济

状况不同,有些布衣之士,很可能是富有资产的地主。所以,布衣这个概念,不能很好地表达阶级观念。贵族这个词也有问题,比如破落贵族很可能一文不名,依然不能准确地表达阶级观念中的关键经济状况问题。

比较“布衣之局”,本文认为“士大夫政治”更有说服力。西汉政权建立,平民出身的刘邦以及众多底层出身的将相,确实给这个时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但是如果以“布衣君相”概括整个西汉,则会产生不少问题。高祖的功臣,因为立功已经改换门庭,拥有田宅,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主,一个因暴力革命而产生的地主阶层拔地而起<sup>⑤</sup>。高祖与诸功臣曾经刑白马而盟,世代相互支持,那么第二代之后,这些家庭出身的子弟如果继续称作“布衣”,显然是不合适的。秦朝已经有博士官,著名的叔孙通就是秦朝的博士官。汉武帝时,因公孙弘的推动,博士官给弟子五十人。其后不断发展,至成帝太学弟子有三千人<sup>[1]3596</sup>。因为学生免除赋役,未来能够在官场就职,史书强调个人需要好学,其实也需要家庭条件保障,由此不难获知学生多来自官宦家庭。父祖朝廷为官,子孙进入太学,后代越发成为制度规定的受益者。学校之外,特别是察举制度之后,选官需通儒学和古代经典,这成为定律。所以,除了西汉这类新王朝第一代之外,是无法用布衣将相之局进行描述的。秦汉之后历代,布衣将相都不如士大夫政治更具概括力<sup>⑥</sup>。

考察秦汉历史,用皇帝制度概括当时的政治者有之,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概念进行概括者有之,用官僚政治概括者有之<sup>⑦</sup>。士大夫政治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有几个方面值得考虑:一为历史实际,士大夫政治与此前的贵族政治是一种有机的历史衔接,扬弃关系清晰;二是逻辑一致,用核心人群定义一个时代的政治特征,士大夫政治与贵族政治相似,这是传统史学方法的运用;三是概念本土,与史料的依存度较高,能够避免舶来概念的常见弊端;四是客观中性,士大夫政治的这个特点,可以减少价值观先行造成的问题<sup>⑧</sup>。

本文涉及几个重大的历史概念,不管是贵族政治还是士大夫政治,都不是一篇论文能够

容纳的,这里难免挂一漏万。贵族政治的特权谱系,是以血统亲疏为原则的,在其他阶层看来就是世卿世禄。士大夫政治,强调的是个人文化道德素质,学而优则仕即表达了由“士”而“大夫”的过程。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体制已经属于士大夫政治。可以说,商鞅变法之后实现了贤者入仕,而这正是“尚贤”思潮的制度化。然而,战国时期各国的君主,皆贵族出身,直到秦末战争,才开始实现突破。与此同时,在理论上王者之后称王,也让位于功高者为王。秦汉之际,时间短暂,但却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变迁,为贵族政治画上了句号。

#### 注释

- ①刘泽华:《“政治”概念大于“阶级”概念》,载《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2—569页。②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五章《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第六章《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③如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史林》1950年33卷2号,第144—163页。④日知主编:《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比较后来考古学的讨论,日知如果能够把邦国与邦国联盟分作两个历史时期,邦国属于古国时期,邦国联盟属于王国时期,那么彼此就获得了一致。⑤苏秉琦:《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载《苏秉琦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34页。⑥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⑦王震中:《邦国、王国与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⑧雷海宗所谓列国,是指诸侯各国。参见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载《历史·时势·人心》,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⑨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中,首论“古代的世官制度”,次论“春秋时的明贤主义”,指明尚贤说是针对世官制度的。载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3—498页。⑩日知:《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古代亚洲民主政治》,《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⑪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⑫张凤喈:《商周政体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⑬龚杰:《周代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1期。⑭唐嘉弘:《略论夏商周帝王的称号及国家政体》,《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⑮郑敬高:《论中国古代国家政体的选择》,《学术月刊》1987年第6期。⑯李泉、杜建民:《论夏商周君主制政体的性质》,

《史学月刊》1995年第3期。⑰童书业：《战国初年鲁国公室的集权与季氏的独立》，《中华文史论丛》第六辑，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9—166页。文中，童书业认为，鲁穆公时期，整个鲁国“官僚政治完全代替贵族政治”，可见童书业认为此前的鲁国是贵族政治的体制。⑱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春秋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强调贵族社会的还有张树国：《春秋贵族社会衰亡期的历史叙事——以〈左传〉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⑲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8页。《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也有此说，更加露骨：“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攻伐，何以得约主！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见《史记》，第459页。⑳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5—307页。㉑最早使用士农工商“四民”概念的是《管子》：“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八《小匡第二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0页。㉒熊存瑞认为，先秦时代“士”以外的三民排序未定，但“士”一直是“四民”之首。见熊存瑞：《汉唐期间的四民与农商对立》，载陆晓光主编：《人文东方——旅外中国学者研究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454页。㉓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㉔阎步克的专著中，没有专门讨论先秦时代的贵族政治问题，但叙述士大夫政治的来源时也有提及，比较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时，他指出门阀政治“与春秋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贵族政治相比，确实显示了某种类似性”。参见《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一章

《结论与推论》，第478页。㉕刘泽华：《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载《洗耳斋文稿》，第399—416页。㉖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群中，也有张良这样的标准贵族，更有叔孙通、陆贾这样的士人群体，布衣的概括，不过表达主要特征而已。㉗参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古代行政管理及官僚病剖析》，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㉘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参见陈苏镇的书评《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2]王国维.殷周制度论[M]//观堂集林: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魏源.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8:64.
- [4]钱穆.国史大纲[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5]赵光贤.先秦贵族政治略说[J].宝鸡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43.
- [6]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M].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3.
-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8]刘泽华.战国时期的“士”[J].历史研究,1987(4):45.
- [9]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57.
- [10]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订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 On Liu Bang'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and the End of Aristocracy

Meng Xianshi

**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engaged in extensive discussions regarding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with varying opinions on its political system.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re the aristocratic era in China, with a political form of aristocracy. The historical upheaval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isintegrated aristocracy and developed scholarly politics. With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Qin Dynasty, the Qin system was implemented nationwide, and China's aristocracy politics was put to an end. However, highest leaders were still from aristocratic families. At the end of the Qin Dynasty, Liu Bang, of humble birth, became the Emperor Gaozu in the peasant war. Liu Bang'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declared the end of the aristocratic era in Chinese history. Historians have discussed extensively on how to summarize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Zhao Yi once summariz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with the phrase "Commoner Generals and Minister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acknowledges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Scholarly Politics".

**Key words:** pre-Qin; aristocratic politics; Liu Bang'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Qin and Han Dynasties; scholarly politics

[责任编辑/启 轩]